

# 不患贫而患无助:城乡困难居民 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

田北海,安宝龙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农村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基于湖北省城乡居民家庭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综合运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和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两类模型,比较分析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剥夺因素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抑制作用,社会救助则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促进作用;比较而言,社会救助的社会公平感促进效应更为稳健。其具体表现为:较之城市社区困难居民,城郊、乡镇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低,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更低,相应地,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高,城郊、乡镇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次之,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低;较之未获得社会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获得过社会救助的困难居民更有可能发生社会公平感,且社会公平感水平更高。正所谓,不患贫而患无助。缩小阶层差距、促进阶层融合、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是提升社会公平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 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社会救助;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

**中图分类号:**C 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9)01-0097-10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9.01.0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sup>[1]</sup>。与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中国社会建设明显滞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未带来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事实与社会共识;相对而言,人们感受更深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社会分化的加剧和社会分配的不公,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

所谓社会公平,就是合理的社会差别。社会公平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制度安排的公平;二是百姓认可的公平。其中,制度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保障,认可公平是制度安排合理性的反映和体现,也是推进制度创新最重要的动力<sup>[2]</sup>。在国家治理创新背景下,如何在制度创新以促进客观公平的同时,提升社会成员的主观公平感,进而推进社会成员从“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sup>[3]</sup>,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

对于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学术界主要形成了社会经济地位假说、相对剥夺假说和社会救助假说三种解释框架。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假说从个体主义视角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着个体的资源获得与支配能力,也影响着个体对个人资源获得结果的归因。多数学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社会公平感有促进作用。然而,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方向并不稳定。一些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公平感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呈现出负向抑制作用;也有研究表明,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并不显著。相对剥夺假说从参照群体视角出发,认为社会公平感是个体以过去的“我们”及当前周围的“他人”为参照,与自身处境进行比较后产生的结果。基于纵向与横向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个体的社会公平感越弱。该假说考虑了社会结构与社

收稿日期:2018-04-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新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研究”(13CSH091);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精准扶贫视角下湖北省城乡支出型贫困问题研究”(201715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662015PY106)。

作者简介:田北海(1977-),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福利社会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

会变迁的因素,在阐释社会公平感的形成机制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忽视了制度因素对社会公平感的可能影响。社会救助假说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强调社会救助制度对弱势群体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但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应然层面和个案研究方法展开,并未得到定量研究的充分验证。

社会公平感从何而来?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与社会救助三类因素,哪类因素的影响更稳健或更突出?换言之,在“寡”“不均”和“乏助”这三类可能影响社会公平感的因素中,哪类因素发挥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城乡困难居民,有哪些因素能有效提升其社会公平感,以消解困难处境对其社会公平感可能产生的抑制作用,进而防止社会心态失衡?以上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尝试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 一、文献回顾

### 1. 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公平感

学者们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的资源获得和支配能力,收入和职业地位的提高会对社会公平感产生促进作用<sup>[4-5]</sup>。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成员更倾向认为分配现状具有正当性,其社会公平感相应较高;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成员则更易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满足于分配现状,其公平感因而较低<sup>[6-7]</sup>。其具体表现为:大中城市居民的就业公平感最强,农村户籍居民的就业公平感相对不足<sup>[8]</sup>;中下层群体对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往往持质疑态度,那些经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人们,他们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感要低于其他群体<sup>[9]</sup>;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当前收入分配的公平感越强<sup>[8,10]</sup>;在体制内单位就业的人公平感较强,个体经营户等体制外就业人员社会公平感较低<sup>[11]</sup>。

然而,社会经济地位并非总对社会公平感有正向促进作用。有研究发现,大中城市居民的不公平感明显高于中小城市<sup>[12]</sup>;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户籍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反而更高<sup>[10]</sup>。对于中国城市居民而言,并非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就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sup>[13]</sup>;与高收入家庭居民相比,收入较高家庭居民认为自己的相对收入低,会产生一种嫉妒感,其公平感会降到谷底<sup>[14]</sup>。教育程度与社会公平感之间亦存在时正时负的矛盾关系<sup>[6]</sup>。受教育程度越高,期待的回报也越高,如果预期回报与现实回报差距较大,反而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sup>[15]</sup>;反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由于其人力资本投资较低,其期待回报率也较低,在收入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也不会轻易做出分配不公的判断<sup>[6]</sup>。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等自雇群体的分配所得主要取决于个人绩效,因而公平感也较高<sup>[13]</sup>,私营和外资企业等单位雇员对劳资关系比较敏感,更容易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sup>[5]</sup>。可见,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归因与公平感密切相关,越是将社会不公平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其社会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公平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等,其社会不公平感就越强<sup>[16]</sup>。

也有学者指出,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sup>[17]</sup>,居于城市底层的群体与其他阶层相比,其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差别,部分阶层地位较低的人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反而比较温和<sup>[12]</sup>。

可见,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学术界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解释路径,并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

### 2. 相对剥夺与社会公平感

所谓“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sup>[18]</sup>。有学者指出,相较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对于人们的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更具有解释力。在个体相对剥夺方面,纵向来看,那些对目前自身社会经济地位有较高评价的群体会产生较高的社会公平感;那些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持负面评价的群体更容易对社会公平持负面评价。横向来看,与其他人相比,对那些自身认同感较高的群体社会公平感较高;反之,社会不公平感越强<sup>[5,19]</sup>。更有学者通过研究农民的幸福发现,农村的生活环境相对稳定,农村居民对长期不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较强的适应性,保有知足常乐的心态<sup>[20]</sup>;而当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时,相对剥夺的作用则会明显显现<sup>[21]</sup>。可见,相对剥夺是影响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 3. 社会救助与社会公平感

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具有内在一致性,要实现社会公平,就必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主要功能在于对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救助<sup>[22]</sup>。当前,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对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作用已经在大量研究中得到证实。已有研究表明,在社会救助实施过程中,社会救助对象,往往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的<sup>[23]</sup>。尽管社会救助群体收入低、生活质量差<sup>[24]</sup>,但由于当前低保救助与其他专项救助的实施,使得救助群体获益颇大<sup>[25]</sup>,救助对象更可能对社会公平做出正面评价<sup>[22-23]</sup>。相反,没有获得救助的群体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捆绑救助很可能会产生社会救助中的“歧视”效应<sup>[26]</sup>,低保边缘群体因被排除在救助之外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剥夺感和不公平感<sup>[27]</sup>。可见,社会救助是促进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在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方面,学术界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现有研究多关注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但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公平感的作用大小及作用方向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

第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以单一研究视角分析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尽管一些研究成果综合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剥夺对社会公平感的作用异同及其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但将社会救助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三类因素综合纳入分析框架开展比较研究,以厘清三类因素的作用孰强孰弱、孰更稳健的不多见。正因为现有研究忽视了一些关键变量,尤其是社会救助因素对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因而对于单类变量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不同的研究常常得出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

第三,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救助有助于提升城乡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这一观点已成为学界共识。但这一共识要么主要基于学者们从应然层面的理论推演,要么主要基于学者们的个案研究,基于定量分析,并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因素的交叉作用,对社会救助之于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展开科学论证的成果甚少。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尝试从综合视角出发,比较分析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三类因素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本文首先以所有调查到的城乡居民样本为分析单位,考察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对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其次以曾因病、因残、因灾、因事故等风险遭遇而导致家庭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为分析单位,比较分析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三类因素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 二、研究假设

参照学界已有的解释路径,本文提出4个假设。假设1至假设3分别预测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假设4主要预测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3类因素比较而言,哪类因素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更为稳健。

### 1. 社会经济地位假设

作为社会心态的一部分,公平感实际上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或折射<sup>[13]</sup>。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于社会公平感的路径,尽管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但一般而言,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或中上层的人,往往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的,而处于劣势地位或下层阶层的人,往往认为社会是不合理或不公平的<sup>[28]</sup>。由此,提出社会经济地位如下: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的公平感有促进作用,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城乡居民越有可能发生社会公平感,且社会公平感越强。

### 2. 相对剥夺假设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为了在缺乏客观标准时获得对自己能力的准确评估,人们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他人进行比较<sup>[29]</sup>。因此,相似性是界定参照群体的关键维度<sup>[30]</sup>。社区情境是影响居民相对剥夺

感和社会公平感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农村地区,城市社区随着单位制的弱化,居民异质化程度不断提高<sup>[31]</sup>,参照群体更为复杂,困难居民所感知的相对剥夺更强烈,社会公平感可能更低。已有研究证实,大中城市居民的不公平感明显高于中小城市<sup>[12]</sup>;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户籍居民的社会不公平感反而较低<sup>[10]</sup>。由此,提出相对剥夺假设如下:

假设 2:相较于城市社区困难居民,城郊或非城镇社区困难居民发生社会公平感的可能性较大、社会公平感水平较高,农村社区困难居民发生社会公平感的可能性最大、社会公平感水平最高。

### 3. 社会救助假设

我国传统的宗亲保障、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源远流长<sup>[32]</sup>;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我国以政府救助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亦日臻完善。社会救助的首要功能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随着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救助的社会公平促进效应将日益显现。相较于“贫而无助”的群体,那些及时得到社会救助的困难群体享受到了社会救助制度的“红利”。作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会理所当然地做出维护现行制度的行为决策,对社会公平现状做出正面评价,其社会公平感也相应较高<sup>[22-23]</sup>。已有研究表明,尽管我国低保救助对象生活状况堪忧,但低保群体仍倾向于对社会公平状况做出正面评价<sup>[24]</sup>。由此,提出社会救助假设如下:

假设 3:相较于没有获得社会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获得社会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发生社会公平感的可能性更大、社会公平感水平更高。

### 4. 社会救助、社会经济地位与相对剥夺影响力比较假设

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具有内在一致性<sup>[22]</sup>。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一项社会调查发现,受访者将社会保障公平视为最重要的社会公平,这表明社会保障对创造公平、维护公平与促进公平的巨大功效。有学者指出,权益失衡是导致社会公平感弱化的根本原因。在当下中国社会,国家特别需要消除制度性歧视,弥补制度缺失。因此,制度公平是维护并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出路<sup>[33]</sup>。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相较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剥夺因素,社会救助对提升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更为稳健。

## 三、数据来源、样本特征与研究设计

### 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5 年 8 月到 9 月湖北省民政厅和华中农业大学联合课题组在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十堰市所做的城乡居民家庭综合社会调查问卷。调查采取分段抽样方法选取样本,首先,按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分别抽取 1 个省会城市(武汉市)和 2 个地级市(黄石市和十堰市);其次,在每个地级市分别抽取 1~2 个区(县),分别是武汉市洪山区和江夏区、黄石市下陆区和阳新县、十堰市茅箭区;为体现样本的代表性,在上述 5 区(县)的街道、城关镇、郊区乡镇分别抽取 1 个商品房社区、1 个单位型社区、1 个老旧社区、1 个城中村社区、1 个旧城保护区社区、1 个安置型社区和 1 个纯农村社区;最后,在每个社区分别抽取 30 户居民进行调查。为保证调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次调查采用一对一的结构式访谈。在分段抽样的过程中,1 个省会城市和 2 个地级市、5 个区(县)直接放入样本框,各乡镇(街道)、社区(村)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各行政村的居民采取系统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720 份,回收有效样本 528 份,有效回收率为 73.3%,其中曾因病、因残、因灾、因事故等风险遭遇而导致家庭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城乡困难居民样本 186 份。

### 2. 样本居民的基本特征

样本居民的基本特征(见表 1)如下:在性别构成方面,男、女占比相对均衡;在年龄构成方面,全

样本和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30岁以下的均不足10%,调查对象多为30岁以上的居民。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全样本和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和高中及以上的比例均占三成左右,分布较为均匀;在政治面貌方面,全样本和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均不足20%,以群众居多;在户口性质方面,非农户口居多,两类样本中非农户口均占约54%;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在全样本中,下层和非下层群体分布相对均匀,下层群体占42%,非下层群体占58%;在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下层群体占比较大,超过70%。

表1 样本居民的基本特征

类型	选项	全样本		城乡困难居民样本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226	43	86	46.2
	女	300	57	100	53.8
年龄	30岁及以下	51	9.7	10	5.4
	31~45岁	119	22.5	36	19.4
	46~60岁	202	38.3	86	46.2
	61岁及以上	156	29.5	54	29.0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53	29.3	66	35.5
	初中	183	35.0	69	37.1
	高中及以上	187	35.7	51	27.4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88	16.7	21	11.3
	群众或民主党派	439	83.3	165	88.7
户口性质	非农户口	284	54.2	101	54.3
	农业户口	149	28.4	51	27.4
	居民户口	91	17.4	34	18.3
社会经济地位	中上层	304	58.0	55	29.9
	下层	220	42.0	129	70.1

注:表中样本数加总后不等于有效样本数的原因是部分样本的问卷答案存在缺失值。

### 3. 研究设计

(1) 变量设置。因变量设置。社会公平感属于主观变量。对于主观变量,理想的操作化方法是将其设置为连续性变量。然而,基于以往的研究经验,在回答态度、认知等主观问题时,调查对象往往很难给出非常精确的量化答案,而是更倾向于给出定性答案。为此,在问卷调查时,课题组请调查对象就“总体而言,当今中国社会是公平的”这一说法给出评价,选项分别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无所谓”“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在统计分析时,首先将社会公平感处理为二元虚拟变量,即“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回答为“无所谓”“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赋值为0,代表调查对象没有社会公平感,回答为“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赋值为1,代表调查对象有社会公平感。其次,为进一步检验调查对象社会公平感水平的高低,进一步将因变量处理为多元有序变量,即:将社会公平感从1到5赋值,1代表调查对象公平感水平很低、2代表调查对象社会公平感水平较低,3代表调查对象社会公平感水平一般,4表示调查对象社会公平感水平较高,5代表调查对象社会公平感水平很高,以“社会公平感很高”为参照组,建立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自变量设置。对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主要参考韦伯“三位一体”社会分层标准和学界惯例,包括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户口类型、在本地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哪个层次4个变量。将“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处理为三分类变量,分别以“小学及以下”“非农户口”为参照组;将“政治面貌”和“在本地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哪个层次”处理为二分虚拟变量,分别以“民主党派或群众”和“非下层群体”为参照组。对相对剥夺的测量操作化为“所在社区类型”,处理为三分类变量,以“城市社区”为参照组。对社会救助因素操作化为“是否享受低保待遇”“是否获得政府救助”和“是否获得邻里朋友救助”3个二分虚拟变量,分别以“否”为参照组。

控制变量。为进一步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性别、年龄变量设置为控制变量。

各自变量、因变量的含义、赋值情况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与赋值	全样本	城乡困难居民样本
		均值或占比	均值或占比
<b>自变量</b>			
社会经济地位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29.3%	35.5%
受教育程度	初中	35.0%	37.1%
	高中及以上	35.7%	27.4%
政治面貌	民主党派或群众(参照组)	83.3%	88.7%
	中共党员	16.7%	11.3%
户口类型	非农户口(参照组)	54.2%	54.3%
	居民户口	17.4%	18.3%
	农业户口	28.4%	27.4%
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属于哪个层次	非下层(参照组)	58.0%	29.9%
	下层	42.0%	70.1%
相对剥夺			
所在社区类型	城市社区(参照组)		58.8%
	城郊或非城关镇社区		22.5%
	农村社区		18.7%
社会救助			
是否为低保对象	否(参照组)		49.5%
	是		50.5%
是否得到政府救助	否(参照组)		34.2%
	是		65.8%
是否得到邻里救助	否(参照组)		67.4%
	是		32.6%
<b>控制变量</b>			
年龄	单位:周岁	52.21	53.56
性别	男(参照组)	57.0%	46.2%
	女	43.0%	53.8%
<b>因变量</b>			
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	是=1; 否=0	55.4%	57.2%
社会公平感水平	从低至高分别赋值:1-5	3.38	3.50

(2)模型构建。为探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等相关变量对社会公平感是否有持续稳健的影响,本文将因变量处理为两种不同类型,分别建立不同的回归模型。

在第一类模型中,因变量“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为二分虚拟变量,0表示“否”,1表示“是”,因此需要建立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text{logit}P = \ln [P/(1-P)] = \beta_0 + \sum \beta_i X_i + \omega \quad (1)$$

式(1)中, $P$ 表示公平发生的概率, $P/(1-P)$ 表示发生社会公平感与未发生社会公平感的概率比值, $\beta_0$ 为常数项, $\beta_i$ 为回归系数,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对“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omega$ 为残差。

在第二个模型中,因变量“社会公平感水平”为多元有序变量。对于因变量为定序变量,学界常用的做法是建立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这一做法的前提是平行线检验不显著,根据这一要求,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text{link}(\gamma_i) = \beta_j + \sum \beta_i X_i \quad (2)$$

式(2)中,link称为连接函数, $\beta_j$ 为常数项, $\beta_i$ 为自变量 $X_i$ 的系数。在本研究中,为了始终保证

平行线检验不显著使模型具有合理性,模型选择的连接函数为 logit 函数,表达式为  $\ln \frac{\gamma_i}{1-\gamma_i}$ 。整个回归分析采用 SPSS19.0 进行。

## 四、结果分析

### 1. 城乡困难居民发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

表 3 显示了运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对“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的分析结果。其中,模型 1 用全样本检验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剥夺对“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模型 2、模型 3、模型 4 用城乡困难居民样本分别检验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对“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模型 1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中,就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言,仅户口类型 1 个变量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非农户口,居民户口的社会公平感发生比提升 44.1%。相对剥夺因素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城市居民,郊区或非城关乡镇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发生比提高 88.3%,农村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发生比提高 122.1%,假设 2 部分得到验证。

模型 2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就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言,仅户口类型一个变量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非农户口,居民户口的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发生比提高 90.1%。其余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 1 仍未得到充分验证。

模型 3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控制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并纳入相对剥夺变量后,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所有变量和相对剥夺变量对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均变得不再显著。

模型 4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剥夺变量,纳入社会救助变量后,回归模型的判决系数上升为 0.214,较模型 3 提高 11.7%。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剥夺变量的影响仍然不显著,反映社会救助因素的 3 个变量则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均对城乡困难居民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有正向影响。其具体表现为:较之未享受低保待遇的城乡困难居民,享受低保待遇的城乡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发生比提高 141.9%;较之未获得政府救助和邻里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获得过政府救助和邻里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发生比分别提高 103.1%和 98.4%。由此,假设 3 部分得到验证。

综合 4 个模型回归结果,假设 2、假设 3 部分得到验证,假设 1 未能得到验证。

### 2. 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水平的影响因素

上述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了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变量对“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为进一步检验相关变量对居民社会公平感水平的影响,本文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表 4 显示了运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对社会公平感水平影响的分析结果。其中,模型 5 用全样本检验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剥夺对社会公平感水平的影响;模型 6、模型 7、模型 8 用城乡困难居民样本分别检验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对社会公平感水平的影响。

模型 5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中,就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言,仅户口类型变量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非农户口居民,居民户口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 logit 值高出 0.407,即社会公平感水平平均提高 60.0%;相对剥夺变量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城市社区居民,郊区或非城关乡镇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 logit 值高出 0.401,即社会公平感水平平均提高 59.8%,农村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 logit 值高出 0.730,即社会公平感水平平均提高 67.4%。由此,假设 2 再一次通过得到验证。

模型 6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就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言,仍然仅户口类型变量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非农户口的困难居民,农业户口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 logit 值高出 0.645,即社会公平感水平平均提高 65.6%。假设 1 仍未得到充分验证。

表 3 发生社会公平感影响因素的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全样本		城乡困难居民样本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自变量				
<b>社会经济地位</b>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0.320(0.726)	-0.536(0.585)	-0.569(0.566)	-0.681(0.506)
高中及以上	0.023(1.024)	-0.206(0.814)	-0.120(0.887)	0.078(1.081)
政治面貌(参照组:群众或民主党派)	0.046(1.047)	0.538(1.713)	0.478(1.613)	0.416(1.516)
户口类型(参照组:非农户口)				
居民户口	0.365*(1.441)	0.642*(1.901)	0.483(1.622)	0.395(1.484)
农业户口	-0.040(0.960)	0.440(1.552)	0.428(1.533)	0.515(1.674)
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属于哪个层次(参照组:中上层)	-0.102(0.903)	0.015(1.015)	0.136(1.146)	-0.259(0.772)
<b>相对剥夺</b>				
所在社区类型(参照组:城市社区)				
郊区或非城关乡镇社区	0.633*** (1.883)		0.471(1.602)	0.727(2.069)
农村社区	0.798** (2.221)		0.451(1.570)	0.666(1.946)
<b>社会救助</b>				
是否为低保户(参照组:否)				0.883** (2.419)
是否得到政府救助(参照组:否)				0.708* (2.031)
是否得到邻里救助(参照组:否)				0.685* (1.984)
控制变量				
性别(参照组:男性)				
女	0.287(1.333)	0.470(1.599)	0.447(1.564)	0.463(1.588)
年龄	0.011(1.011)	-0.016(0.984)	-0.012(0.988)	-0.010(0.990)
-2 对数似然值	634.868	231.591	223.670	204.716
Nagelkerke R <sup>2</sup>	0.059	0.079	0.097	0.214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数字为发生比。

模型 7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控制社会经济变量后并纳入相对剥夺变量,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所有变量和相对剥夺感变量对社会公平感水平的影响均不显著。

模型 8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剥夺变量、并纳入社会救助变量后,模型的判别系数上升为 0.226,较之模型 7 提高 14.6%。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所有变量中,仅受教育程度 1 个变量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初中文化程度城乡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 logit 值减少 0.719,即社会公平感水平平均降低 32.8%。相对剥夺变量的影响变得显著,较之城市社区困难居民,郊区或非城关乡镇社区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 logit 值高出 0.642,即社会公平感水平平均提高 65.5%,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 logit 值提高 0.871,即社会公平感水平平均提高 70.5%。反映社会救助的各个变量的影响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未享受低保的城乡困难居民,低保户的社会公平感水平 logit 值提高 1.045,即社会公平感水平平均提高 73.9%;较之未获得政府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获得过政府救助者的社会公平感水平 logit 值提高 0.715,即社会公平感水平平均高出 67.2%;较之未获得邻里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获得邻里救助者的社会公平感水平 logit 值提高 0.7,即社会公平感水平平均提高 70.5%。

综合 8 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假设 3 得到验证,假设 2 部分通过验证,假设 1 未通过验证。

从以上两类模型的对比分析结果来看,在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和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不稳健。社会救助所有变量对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水平均有显著影响,且两类模型呈现的分析结果完全一致,表明社会救助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是显著且稳健的。相对剥夺变量对社会公平感也具有显著影响,但在两类模型中呈现的结果有差异。在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相对剥夺变量对是否发生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则显示,相对剥夺变量对社会公平感水平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相对剥夺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会受干扰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其影响是不稳健的。综上可知,只有社会救助变量在两类模型中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稳健。

由此,假设 4 得到验证。

表 4 社会公平感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全样本		城乡困难居民样本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b>自变量</b>				
<b>社会经济地位</b>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0.270(0.220)	-0.392(0.338)	-0.418(0.346)	-0.719***(0.359)
高中及以上	-0.028(0.248)	0.046(.387)	0.148(0.396)	-0.243(0.408)
政治面貌(参照组:群众或民主党派)	-0.054(0.235)	0.538(0.448)	0.491(0.450)	0.353(0.461)
户口类型(参照组:非农户口)				
居民户口	0.407*(0.230)	0.291(0.366)	0.267(0.382)	0.403(0.393)
农业户口	0.117(0.227)	0.645*(0.333)	0.411(0.384)	0.375(0.404)
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属于哪个层次(参照组:非下层)	-0.113(0.170)	-0.022(0.305)	0.124(0.310)	-0.398(0.344)
<b>相对剥夺</b>				
所在社区类型(参照组:城市社区)				
郊区或非城关乡镇社区	0.401*(0.208)		0.371(0.363)	0.642*(0.359)
农村社区	0.730*** (0.274)		0.666(0.434)	0.871*(0.459)
<b>社会救助</b>				
是否享受低保待遇(参照组:否)				1.045*** (0.340)
是否得到政府救助(参照组:否)				0.715** (0.341)
是否得到邻里救助(参照组:否)				0.700** (0.318)
<b>控制变量</b>				
性别(参照组:男性)				
女	0.320*(0.175)	0.411(0.284)	0.408(0.293)	0.331(0.302)
年龄	0.013*(0.007)	-0.004(0.012)	0.000(0.012)	0.003(0.012)
Nagelkerke R <sup>2</sup>	0.051	0.058	0.080	0.226
平行线检验	0.165	0.455	0.301	0.605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湖北省城乡家庭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综合运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和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两类模型,比较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 3 类因素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无论是在总样本中还是城乡困难居民样本中,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公平感均不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单纯的社会经济地位并非造成居民社会公平感不同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印证了当前学界的一些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解释路径,在不同群体中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sup>[19]</sup>。

第二,相对剥夺因素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抑制作用,但作用不太稳健。较之城市社区困难居民,城郊、乡镇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低,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更低,相应地,农村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高,城郊、乡镇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次之,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低。

第三,社会救助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促进作用,且作用稳健。其具体表现为:较之未获得社会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获得过社会救助的困难居民更有可能发生社会公平感,且社会公平感水平更高。

第四,比较而言,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和社会救助三类因素中,社会救助的社会公平促进效应更为稳健。正所谓,“不患贫而患无助”,贫而无援、寡而无助才是抑制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根本原因。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缩小阶层层际差距、

促进阶层融合、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是提升社会公平感,促进社会成员“有感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 参 考 文 献

- [1] 林毅夫,姚洋.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 郑杭生.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的一种社会学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6):36-42.
- [3] 郑杭生,黄家亮.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中国社会转型新命题及其破解[J].社会科学家,2012(1):7-11.
- [4] 翁定军.阶级或阶层意识中的心理因素:公平感和心理倾向[J].社会学研究,2010(1):85-110.
- [5] 孟天广.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J].社会,2012(3):108-134.
- [6] 李颖晖.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J].社会,2015(1):143-160.
- [7] 倪青山,罗楚亮,谢维怡.公正观念与分配公正[J].湖南大学学报,2015(1):47-55.
- [8] 艾楚君,田双喜,庄创奇.青年就业公平感结构、现状与对策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6(6):91-101.
- [9] 胡建国.社会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中国公众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再探讨[J].人文杂志,2012(6):148-154.
- [10] 文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认知与诉求[J].财经研究,2015,41(11):20-33.
- [11] 吴菲.不公平有几何?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测量[J].兰州学刊,2010(5):94-98.
- [12] 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0(3):31-49.
- [13] 龙书芹,风笑天.社会结构、参照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J].青年研究,2015(1):39-46.
- [14] 徐仲安,靳共元,张晓林,等.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3(4):72-96.
- [15] 吴清华,冷晨昕,祝仲坤.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28-136.
- [16] 王甫勤.当代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一项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1(2):155-183.
- [17] 胡荣,陈斯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J].厦门大学学报,2010(4):97-105.
- [18] STOUFFER S A, SUCHMAN E A, DEVINNEY L C,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Volume I of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World War II[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9, 14(4):557-559.
- [19] 周兵,刘成斌.中国青年的收入分配公平感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5(4):48-53.
- [20] 廖永松.“小富即安”的农民:一个幸福经济学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4(9):4-16.
- [21] 倪志良,贾占标,解萧语.相对剥夺、非农就业与农民幸福感[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12):64-74.
- [22] 叶宝忠.论社会保障对社会公平的保障[J].宁夏社会科学,2009(2):68-71.
- [23] 方菲.农村低保制度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探讨[J].求实,2013(1):90-93.
- [24] 梅建明,刘频频.城市低保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及低保救助制度——对武汉市387户低保家庭的调查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5):15-20.
- [25] 李薇,丁建定.结构整合:构建中国公平型社会救助制度[J].社会保障研究,2014(5):37-43.
- [26] 李秉文.社会救助:“全民就业”式优于“全民低保”式[J].经济学家,2010(11):28-33.
- [27] 李春根,夏珺.中国城市低保边缘群体合理需求分析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4(4):68-74.
- [28] 李春玲.各阶层的社会不公平感比较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2006(1):71-76.
- [29] FESTINGER, LEON.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J]. Human relations, 1954, 7(7):117-140.
- [30] 吴菲,王俊秀.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J].社会,2017(2):74-105.
- [31] 孙炳耀.社区异质化:一个单位大院的变迁及其启示[J].南京社会科学,2012(9):49-54.
- [32] 丁建定.唐代社会保障思想、实践及其评价[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13-20.
- [33] 郑功成.中国社会公平状况分析——价值判断、权益失衡与制度保障[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2-11.

(责任编辑:陈万红)